

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龚先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作者简介] 龚先庆(1970-),男,湖北南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共党史研究。

[摘要] 艾思奇较早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并对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理论论述;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杰出的践行者和捍卫者;他积极研究、阐发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建国以后,艾思奇继续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际的进一步结合。

[关键词] 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联系实际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3-0282-05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之一。他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第500页)这里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毫无疑问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艾思奇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倡导者,也是毛泽东这一号召的积极实践者。1938年春,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指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2](第387页)他认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活动“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他强调哲学中国化、现实化运动应该有它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对新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2](第388页)。在艾思奇看来,辩证法唯物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基础。离开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也就没有活的辩证法唯物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这里是一致的。

艾思奇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第462页)在抗战的背景下,面临着十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但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引大的方向,而且更需要辩证法唯物论来分析、解决各种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既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启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毛泽东说过:“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第778页)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惟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从,不深入研究中国国情和革命斗争的实际,给中国革命带来十分惨重的损失。历史教训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是惟一正确的出路。

继毛泽东、李达等之后,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因为它有“一般的正确性”,“倘若它没有这一般的正确性,倘若它仅仅是特殊的东西,那就完全谈不到‘化’的问题了。”^[1](第482页)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正确性就在于: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的理论,它揭示了客观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在任何国家,都能表现出它的一般必然性。其次,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研究一切实际问题的科学方法,我们必须根据它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当前的问题。再次,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行动指南。凡是有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发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正确性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首先,一般与特殊分不开,一般的东西要通过各种各样特殊的东西表现出来。在中国应用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其次,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先进者所奠定的理论中的某些个别论点,在新的条件下常常不能不有多少改变”^[2](第483页),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而是发展着的理论。再次,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实践与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里就一定有‘化’的意思,也就有‘创造’的意思。”^[2](第481页)这里的“创造”,就是指“在不变的正确基础原则上的新的理论和事业的创造”^[2](第481页)。

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作了初步的论述,提出了三个基本观点: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核心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因为辩证法唯物论以它极大的包含性吸取一切哲学的精华,“辩证法唯物论是最和实践一致的哲学”。丢掉这个中心,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继续和深入,艾思奇肯定了过去所做的哲学通俗化工作对哲学的中国化的重要意义,因为通俗化中也包括了一定的中国化、现实化的内容。从另一方面来说,只有做到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才能做到充分的通俗化大众化。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少数人书斋里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而是全国性的、进步的、对于哲学理论有兴趣的战士,都应共同努力完成的运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与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简单地说,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艾思奇在《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一文中,阐明了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点的内在要求。他明确指出,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是由辩证法唯物论的特点决定的。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最彻底革命的世界观,这个特点决定了它与其他哲学研究的方法不同。要评判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是否有成就,就要看这研究的人在遇到革命的实际问题时,能否在辩证法唯物论的观点上给以正确性的解决,而不是看他的纯理论讲得多么熟练。

在《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一文中,艾思奇论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真正含义。艾思奇认为,不是理论高于实践,而是实践决定理论。我们讲哲学中国化,讲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中国革命的实践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内在要素。

对于马克思主义如何联系中国革命实际这个问题,艾思奇特别强调,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成公式拿来直接套中国革命的实际,必须根据中国的需要和中国的特点来接受它、应用它和发展它。这是因为:中国没有直接产生系统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西欧的社会条件和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创立的。从外国学来的理论知识,在外国的条件下无论如何正确,拿到中国来时,如果不与中国的具体环境相结合,仍会变成错误。

艾思奇在《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还专门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理论”和“实际”概念的理解。他说:“我们的理论必须是与实际密切联系着的理论,是从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2](第671页),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理论的概念。也就是说,外国的名著里所抽出来的原则公式不是惟一的理论,对于毛泽东的著作、报告,对于党的文件,同样是理论。艾思奇接着说,我们过去所了解的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只是两者机械的结合,一方面把握着一个“理论”的公式,另一方面随便拉一些例子来做证明。这不是真正的联系实际。“所谓联系实际,必须是把适当的理论作为指导武器,来解决当前的一定的实际斗争问题。而且,要判断我们是否能正确地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够正确地解决了当前的问题。”^[2](第671页)

艾思奇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式进行了全面的探索。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式划分为三个层次:从生活中举出实际例子,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范畴和原理;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基本原理,来说明中国革命和现实生活中碰到的各种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创造

性地解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工作方法问题这样三个不同的层次。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层次,是用生活中的实际例子,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范畴与原理。“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对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12](第 387 页)列宁也指出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14](第 467 页)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典型范例。但艾思奇也指出,这只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较低层次。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较高层次,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去分析、认识和说明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艾思奇认为:“研究哲学的真正成绩并不仅表现在书本知识的如何渊博,而主要表现在革命实践中处理问题,是否正确。”^[12](第 543 页)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不同时期,艾思奇都致力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与解决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他的《哲学与生活》一书,其中有不少的内容都是就重大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因而被毛泽东称为“更深刻的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高层次,就是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工作方法,这是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无形却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应用,因为这里所要解决的不仅只是各种具体的问题,而且涉及到对各种具体问题的规律的把握,涉及个人、政党等的思想方法、思想路线、工作方法等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著名命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作的哲学概括,并把它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与行动的最高原则。正是在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下,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实践中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艾思奇指出,“真正的‘实事求是’,不仅仅在于理解事实和认识事实,而且要从这种理解和认识中求得指导行动,推动工作的方法。”^[12](第 626 页)这也就是最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谛。

三、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捍卫者。艾思奇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阐发与宣传,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做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工作。建国以后,艾思奇继续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际进一步地相结合,把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宣传与运用推进到新的阶段。

(一)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之一

艾思奇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的具体应用的问题,在理论上的开展,是和几种不正确的见解争论过来的。”^[12](第 552 页)在这个过程中,艾思奇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艾思奇在总结“五四”至 1933 年哲学战线的斗争时,重点揭露和批判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和唯意志论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艾思奇指出,生命哲学是欧洲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的。至于唯意志论,其错误是主观随意性,他们的性质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论。对于胡适的实用主义,艾思奇认为,“谁也知道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它能一变而成唯心论哲学。”^[12](第 62 页)

艾思奇对抗战前后的各种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哲学也作了很严肃的批判。艾思奇认为,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与中国封建哲学的结合,是中国现代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哲学的特征。这是由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决定的。他在《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中,着力批判了陈立夫的唯一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和阎锡山的“中”的哲学。他指出,陈立夫的唯一生论哲学代表着十多年当权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世界观,并且是这些年来在中国与辩证法唯物论相对抗的最主要的思想之一。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是要求人民盲从的极端有害的唯心主义哲学,应该揭露它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买办性的法西斯主义真面目。阎锡山的“中”的哲学是与一定政权力量结合的,与辩证法唯物论相对抗的一种哲学,是地方政权当局者的哲学。艾思奇还批判了叶青对唯物辩证法的歪曲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散布的谬论,批判了向林冰把唯物辩证法拒斥于科学方法之外,阻碍唯物辩证法的实际应用的错误思想。

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通俗化的杰出贡献,突出地体现在他于 1934 年撰写的《大众哲学》一书。《大众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和贡献,首先是在于它的通俗性。正如李公朴所说:“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力气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13](第 231 页)又说“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们的指南

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15](第233页)其次,《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还表现在其系统性与科学性上。《大众哲学》共分四章:序言、本体论(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实际上是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因此说,这部书是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结构和体系。同时,艾思奇撰写《大众哲学》的笔法新颖,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因而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尤其是青年通过它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走上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革命道路。艾思奇不愧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杰出代表之一。

(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是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做的一项最有意义的工作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艾思奇非常注重对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阐发与宣传。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革命的实际问题分不开,因此不仅应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著作,也应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者的名著。艾思奇明确指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他和朱德同志关于游击战问题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辉煌的范例”和“最大的历史收获”^[2](第555页)。这些著作都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读书。艾思奇认为,毛泽东的这些著作,在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上,有许多新的贡献,这证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在哲学本身上就能把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具体化,并加以发展。这些著作还证明,只要正确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用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就能认清斗争方向,争取革命胜利。

对于毛泽东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艾思奇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说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很难。艾思奇多次谈到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的重要意义,并且写了《反对主观主义》、《“有的放矢”及其他》等文章,做了《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着重论述了毛泽东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肯定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批评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错误思想倾向。

建国以后,艾思奇在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主要的是两项:

一是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紧密结合起来,注重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着重强调毛泽东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力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学习态度。对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是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哲学著作的研究与阐发。艾思奇指出,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是在总结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创造了著名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理。艾思奇认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长期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而达到的理论总结,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艾思奇花了巨大的精力辅导干部重新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写了大量的介绍、阐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文章。他认为这可以使干部进一步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使一切参加革命的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干部更善于在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的长河中游泳,更善于担当起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务”^[2](第124页)。

(三)建国以后,艾思奇把自己的哲学活动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结合起来,批评错误的思想,继续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首先,艾思奇密切关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及时对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哲学思考和哲学总结,从中提出和论述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如,结合过渡时期的实践,及时提出了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职能和作用,主要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除了一些人对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的片面认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对生产发展规律进行了研究和论述;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他针对当时的实际,及时研究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努力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规律,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动力与后退运动的辩证关系,等等。艾思奇同志的这种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的学风,永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楷模。

其次,从哲学高度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主观主义进行了批评。在《认识客观规律,鼓足革命干劲》等文章中,艾思奇及时地从哲学的高度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等错误思想进行了分析与批评,论述了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迷信与科学的辩证关系,人民群众力量的无限和有限的辩证关系等问题,提出“既要深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无穷无尽,又要注意到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方面”、“冲天的干劲一定要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等重要观点。艾思奇同志及时提出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属难能可贵,他的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第三,结合我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公开发表了《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

史》、《辩证唯物主义读者讲课提纲》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三部哲学著作。这三本书紧密联系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简明扼要,深入浅出,比较全面系统地准确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确立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清除各种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宣传,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的贡献。

当然艾思奇不是完人,他在建国以前的哲学活动中难免有思想的不成熟之处,尤其是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政治环境和不正常的学术环境中,他的思想与活动必然受到政治上“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存在一些偏颇与缺失。如在哲学论争中,没有很好地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原则界限;在哲学批判中存在着简单化、片面性倾向等。在哲学与实际工作二者之间,哲学既要通过提供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实际工作,也要对实际结果予以反思。哲学绝不是跟在实际后面亦步亦趋,单纯为现行政策做论证;要正确处理好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学术问题应该遵循认识发展和科学发展的规律,允许自由讨论,接受实践检验。当然,学术研究也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一时的课题,而是随着实践的新发展不断与时俱进的课题。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研究艾思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可以使我們更加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解决我们面临的现实课题,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参 考 文 献]

- [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合订横排一卷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 [2] 艾思奇. 艾思奇文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3]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俄] 列宁. 列宁全集:第 36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5] 艾思奇. 大众哲学:第 1 卷[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严 真)

AI Siqi and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GONG Xianq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Law, Wuhan 430074, Hubei, China)

Biography: GONG Xianqing (1970-), male, Lectuer, Docter,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Economics & Law, majoring i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history of the CPC.

Abstract: AI Siqi tried to impel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his life. He expounded the concept early in the history, and discussed its essence and the path; He is the forerunner and guardia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he tried his great to study and popularize Maosim, and he went on impell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new Sinic.

Key words: AI Siqi; Marxist philosophy; Sinic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ory and the fact